

郁达夫似乎一直都能踩中时代的鼓点，他趁着“五四”的时代精神兴起，进入文坛，之后则因偏于左倾的思想与新兴的时代大势合拍，又因为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因此我们的文学界对于郁达夫的评价一直非常高。尽管郁达夫的旧诗写得极好，但为其博得文学家名号的则是小说。一方面因为旧诗是夕阳体裁，难以打动青年的心，而小说是其时的朝阳体裁，新派人物皆或读小说，或写小说；另一方面因为郁达夫小说的内容，接触到了社会问题，故能成为热点，引起共鸣。由此，郁达夫被推上了时代的舞台。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沉沦》由泰东书局出版，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追捧，江浙一代青年纷纷前往上海购买此书，一时洛阳纸贵，人人皆谈郁达夫。泰东书局先后将此书重印，印数达3万多册，销量非常可观。由于《沉沦》一书，描写性饥渴、性压抑、性心理和狎妓等情节，且充满着颓废、哀伤、绝望的情绪，因此该书一出版即惊世骇俗，一时议论纷纷。诚如郭沫若所说：郁达夫“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雨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郭沫若《论郁达夫》）一方面是《沉沦》的热销，青年人的喜欢，一方面是保守派的攻击。幸亏周作人作《沉沦》一文，为郁达夫辩护，方一锤定音，肯定了他的文学成就，郁达夫在文坛立稳了脚跟。

郁达夫自述对小说内容的理解道：“原来小说的内容，不外乎人生的记录。小说家的认识人生，第一系由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第二须靠着他人的生活记录的。”（郁达夫《历史小说论》）此为郁达夫夫子自道，他的小说大致就是遵循了这两点：一、记录了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可称自叙传；二、记录了他人的生活经验，描写了其时的局面，充满了时代的消息。

郁达夫记录自己生活经验的小说有，《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茫茫夜》《秋柳》等。这一类小说中，大都有一个神经衰弱、多愁善感、生着肺病、颇具名士风流的“我”，“我”饱受性压抑之苦，或偷窥，或性反常，或终于去狎妓。小说把“我”的性压抑描写得惊心动魄，把狎妓前后“我”的挣扎和自责也写得细致入微。《沉沦》《银灰色的死》等作于郁达夫留日之时，其时他不过20多岁，恰是血气方刚之年，但又疾病缠身，去国多年，身心交困，故有此作。这些小说可谓为郁达夫的“自叙传”，其中氤氲着郁达夫的经历和体验，他曾记录过其经历：“受了龟儿鹤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女，这一晚坐到更深，更狂歌大饮之余，我竟把我的童贞破了。第二天中午醒来，在锦被里伸手指着了一个温软的肉体，更模模糊想起了一前一晚的痴乱狂态，我正如在大热的伏天，当头被泼上了一身冰水。那个无智的少女，还是袒露着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我看着玻璃窗外的半角晴天，看看枕头上边散乱着的粉红樱纸，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郁达夫《雪夜——本国国情的记述》）

郁达夫的这一类小说写灵与肉的冲突，不是灵战胜了肉，而是肉战胜了灵，只是“我”在事后会后悔、自责。“五四”时期所谓“人的解放”，在郁达夫的小说里就表现为欲望的解放，是存欲望，但也未完全灭天理（若灭了天理，“我”就不会自责）。性应该处于合适的位置，不宜太低，也不宜太高，郁达夫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将私人话语公开化了。所以，尽管郁达夫是写个体的经历，但他的小说与

# 郁达夫小说：“人生的记录”

□刘 涛

“五四”前后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合拍，因此也能够感动他人，于是成为了时代标志性的作家。

第一类小说最为典型者莫若《沉沦》。《沉沦》是郁达夫的名篇，郁达夫已去世多年，但今天一提起郁达夫，我们首先还是会想起这篇小说。《沉沦》中的“我”孤身一人在日本留学，极有文学青年范儿，喜读《黄仲则》，闹着忧郁症，“自以为是孤高傲世的贤人、超然独立的隐者，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我”经受着性压抑之苦，沉湎于性幻想、自渎、偷窥等行为之中，最终狎妓，却受到道德谴责，于是选择投海自沉，临死之前喊出“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若仔细区分，《沉沦》中的“我”尚可二分。一、“我”备受性苦闷之折磨，难以自持。郁达夫在《沉沦》序言中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Hypochondriac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郁达夫《沉沦》自序）二、但“我”不完全只沉湎于个人的私情绪之中，“我”尚有强烈的国恨。郁达夫的《沉沦》之所以能够打动青年的心，就是依靠这两个方面：一、自身处境（以性苦闷写出），二、国家处境（以个人处境写出）。个人恶劣的处境乃由国家处境造成，因此欲改变个人处境，须改变国家处境，因此《沉沦》这篇看来只是写私人经验的小说就有了崇高的情感。其后郁达夫思想逐渐偏向革命，于此亦能看出苗头。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大致走“以日为师”之路，又由于空间上的接近，开始较大规模地向日本派遣留学生。于是，有作家会记下留日学生的处境、状态等，开山之作乃平江不肖生的《留东外史》。《留东外史》是“黑幕小说”，揭露了其时留学生们污秽不堪的生活，他们胸无大志，只知饮酒狎妓，惟知投机钻营。郁达夫的《沉沦》也能见出民国时期留日学生的心态和处境，但《沉沦》充满了现代气息，青年充满着“现代”情感。中国描写狎妓的小说多矣，譬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但这部备受胡适和张爱玲推崇的小说颇似“嫖经”或“嫖界指南”。《沉沦》也写狎妓，但当事人并非乐在其中，而是事后充满了忏悔、自责，甚至于自沉海中。《留东外史》《海上花列传》其中乌烟瘴气，实在使人“沉沦”；《沉沦》虽色调黑暗，但让人觉得其中尚有光，《沉沦》看似“沉沦”，但却能够引领人上升。

《银灰色的死》《南迁》《茫茫夜》《秋柳》与《沉沦》的情节、氛围等大致相同，也写“我”颓废的生活，沉湎于酒色之中。只是《沉沦》写得最好，因此盖过了其他篇。

私人经验尽管独特，但毕竟有限，久之，一方面作者可能会枯竭，另一方面读者也会厌倦。因此小说家还须尽量做到“他心通”，懂得他所处的时代和时代之中其他人的生

活。郁达夫记录他人生活的小说有：《采石矶》《碧浪湖的秋夜》《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她是一个弱女子》《二诗人》《唯命论者》《杨梅烧酒》等。郁达夫笔下的人，大致有：历史人物、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学生等，郁达夫以小说的方式记录了他们的生活，写出了他们的处境。

《采石矶》《碧浪湖的秋夜》写历史人物——黄仲则与厉鹗。虽是写历史人物，实际乃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叙黄仲则、厉鹗生平，还是郁达夫的“自叙传”。黄仲则（1749~1783），4岁而孤，家境清贫，少年时即负诗名，为谋生计，曾四方奔走。一生怀才不遇，穷困潦倒，后授县丞，未及补官即在贫病交加中客死他乡，年仅35岁。厉鹗（1692~1752），字太鸿，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僻，爱山水，尤工诗词。见郁达夫生平，与黄仲则、厉鹗颇多类似之处，郁达夫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故以黄仲则或厉鹗之名写自己的处境和心境。譬如，郁达夫曾说：看了两遍黄仲则的《全集》，觉得感动得我最深的，于许多啼饥号寒的诗句之外，还是他的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和他那一生潦倒后的短命的死。”（郁达夫《关于黄仲则》）《采石矶》中的黄仲则的形象如此：“自小就神经过敏的黄仲则，到了二十多岁的现在，也改不过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质来。”本来是纤长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余，穿了一件百衲衫。立在人从中间，好像是怕被风吹去的样子。”《碧浪湖的秋夜》中厉鹗虽贫病交加，落落寡合，但才情极高。黄仲则和厉鹗贫病、纤弱敏感，才高气傲，如此形象、品质，既颇似《沉沦》的主角，也与郁达夫本人类似。

《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较之于《沉沦》起了显著的变化。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迟桂花》中依然有一个“我”，但“我”从《沉沦》中的主角逐渐淡化为配角，女工、车夫、农家女成了小说的主角。工人是新人，郁达夫敏锐地把握住了时代的消息，以小说记录了工人的形象。在49年之后的文学史叙事中，郁达夫的这几篇小说备受推崇，就是因为他写了工农大众在其时的处境，这与左倾的思想相合。

《春风沉醉的晚上》写“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境，但不是落难才子遇到佳人，也不是浪荡子碰见妓女，而是落拓文人与女工相逢。《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与《沉沦》中的“我”非常类似，也曾留学日本，是敏感的文学青年，患有神经衰弱病，失业半年，于是迁居贫民窟。女工名二妹，苏州东乡人，从小系在上海乡下长大的。她父亲也是纸烟工厂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来和她父亲同住在那间房里，每天同上工厂去的，现在却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女工既是时代的新新人物，也是郁达夫小说中的新人物，但郁达夫没有对其过度拔高，而是比较真实地写出了上海女工的生活状态、处境、遭遇和心态。《沉沦》中落拓文

人碰见了妓女，于是狎妓；《春风沉醉的晚上》于性心理等方面描写非常节制，而且最终以情欲升华的方式结束，小说如此写道：“我看了她这种单纯的态度，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我想把两只手伸出去拥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说：‘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的处女毒害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

《薄奠》与《春风沉醉的晚上》结构类似，“我”的经济境况略有改观，而且完全脱尽了《沉沦》中的性苦闷和性压抑，“我”成了底层穷苦百姓的同情者甚至成了他们的代言人，女工则变成了车夫及其家人，但他们的处境大致类似。《薄奠》花了大量的篇幅去描写车夫的贫穷困苦，小说通过车夫夫妻吵架写道：“这臭东西把我辛苦苦苦积下来的三块多钱，一下子完了。去买了这些捆尸的布来。”车夫的志向是攒钱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与《骆驼祥子》类似），但志向未能实现就在“南下洼的大水里淹死了”，家里一贫如洗，惟有柔弱的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我”对车夫充满了同情，不时给予接济，最终也出席操办他的丧礼，但“我”力量有限，因此只是“薄奠”。小说结尾处，我愤怒地喊：“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

《她是一个弱女子》篇幅较长，小说以郑岳秀为主，写了一个观念不同的女子的遭遇和命运。冯世芬思想进步，离家出走，到上海参加革命，成为女工人和革命者。李文卿是富家女子，娇生惯养，花钱如流水，以性为尚，不分男女，不管尊卑，不顾伦常，一切通吃。郑岳秀在冯世芬和李文卿这两种思路之间犹豫不决，最后终于经不住诱惑，走了李文卿之路，在几个男人和女人之间摇摆犹疑。郑岳秀历尽劫难，最后被奸杀，死状甚惨，题目中的“弱女子”云云即指郑岳秀，郁达夫对其人有批评，但也充满了同情。冯世芬尽管不是小说主角，但郁达夫对她的抉择与故事较为赞赏，她的结局亦是善终。《她是一个弱女子》颇受时人诟病，因为小说中关于性的描写非常出格，这篇小说可谓郁达夫性描写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有同性恋、异性恋、女恋女、男恋男等。譬如，苏雪林批评他道：“近年来他以这类文学销路渐少，而技巧又苦于无法进步，遂明目张胆为兽欲的描写，而有《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现。书中女主人公追逐性的满足，宛似疯狂，而且同性恋爱，叔侄结婚，妇女通奸等故事，秽恶悖乱，无以复加。可谓集‘卖淫文学’之大成，刺激性不能说不强烈了，而以艺术过于糟糕故引起青年的不满。”（苏雪林《郁达夫论》）尽管郁达夫对郑岳秀持批评态度，但其中关于性的描写确实过分了，有喧宾夺主之势，然而小说中不经意有一些对北伐时浙江民情的描写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背景下上海情况的描写，今天读来倒也是意外的收获。

《二诗人》《唯命论者》《杨梅烧酒》描写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态。《二诗人》以幽默、夸张的笔调写了“二诗人”的丑态，他们不学无术，只会作“噢噢呵！我回来了，我的圣母！”一类的诗，他们招摇撞骗，最终被痛打一番。《唯命论者》写小知识分子李德君的悲惨生活，他收入微薄，但须养家糊口，其妻偶尔买了一张奖券，李德君误以为中了头奖，往上海领奖不得，于是投河自杀。《杨梅烧酒》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态，他们借酒浇愁，醉后出现幻象，丑态百出，读来让人心酸。

郁达夫的小说大致就是以上两类，风貌也大体如此。

## 为创造社编刊始末

□郭 瑾

粗面条填肚。他当时准备写一篇小说《茫茫夜》，可简陋的生存环境，最终使理想成了泡影。在这样的境遇下，郁达夫向赵南公提出去安庆法政学校任教的要求。书局考虑到他去安庆任教又遥领编辑工作，还节省费用，便同意了。郁达夫到安庆后，忙于编讲义，上课，改作业，直到1922年1月放寒假时，才回到上海，继续致力于编辑和出版《创造》季刊创刊号。一个月后，创刊号终于编成并发稿。在一个月内，他为创刊号赶写了中篇小说《茫茫夜》，翻译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杜蓬莱格》的序文，撰写了《艺文私见》及《编辑余谈》等。5月1日创刊号终于问世，还登载了郭沫若的《创造者》（诗）、《棠棣之花》第二幕（戏剧）、《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海外归鸿》（三封信），张资平的《上帝的女儿们》（小说），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戏剧）等。作品大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并流露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也有一种自我情绪的表现，文笔清新。刊物出版后，受到了文坛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供不应求，6月又重新印出一次横排本。

关于《创造季刊》的创刊号，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因《咖啡店之一夜》印错的字太多，而引起田汉对郁达夫的误会。创刊号出版时，由于泰东书局校对员的荒疏，有不少错误。据说有人统计过，创刊号的错字在2000字以上。尤其是田汉的《咖啡店之一夜》的错处最多。这使得田汉怀疑郁达夫“有意要陷落他，毁伤他在国内的名誉”。此事在当时引起一场学者间的笔战，最终以田汉、郁达夫相互致信、致歉和平结束。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1922年8月25日，《创造》季刊一二期出版，其中刊登了郁达夫的小说《风铃》和随笔《夕阳楼日记》。郁达夫在《夕阳楼日记》中，指摘了余家菊自英文重译德国威廉著《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书的错误，结果引起了创造社和胡适派文人间的一场尖锐的笔战。创办刊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与困扰，但郁达夫从没有放弃过。

随着《创造季刊》的销量大增，也为了促进新文学的发展和扩大创造社的影响，郁达夫向郭沫若、成仿吾提议，在继续办好《创造》季刊的同时，再办一个小型的灵活的《创造周报》。经过紧张筹备，《创造周报》创刊号于1923年5月13日出版。这一刊物为16开本，每期8页，印3千份，逢周末，泰东书局门口常被青年人拥挤着，将油墨未干的周报一抢而空。《创造周报》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令他们三人很欣慰。但工作量很繁重，正如郭沫若所说：“每周要发一次稿，我们最怕的是头一篇，3个人轮流着做，都感觉着有点青黄不接。又要由自己校对，自己跑印刷所。礼拜一发稿，礼拜二送初稿，礼拜五二校，礼拜六三校，礼拜日出版。整个礼拜全没有空闲的时间，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隶一样，动也不能动一步。”

由于没有一个稳定的出版阵地，创造社同人的稿件在其他刊物发表，多受到继母式的虐待，所以他们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出版部，除了出版期刊，也可出版书籍。正当郁达夫主张恢复《创造》以及《洪水》杂志时，患肺结核，不停咳嗽。此时的他们没有资金来源，于是印

发5元、10元的小额股票，青年人认购入股后，再购买创造社出版物可享7折优惠，这一政策吸引了一批青年人，很快筹到了资金。在创造社同人的协助下，出版部终于在1926年3月15日成立，病体刚愈的郁达夫立即投入到《创造月刊》的编辑工作中，1925年9月16日创刊的《洪水》半月刊，也自第2卷第13期起收回创造社出版部自印（原由光华书局出版）。创造社出版部的成立与创造复刊，标志着创造社后期活动的开始。

1926年3月，就在出版部成立的同时，郭沫若接到广东大学（后改为国立中山大学）的回信邀请，同邀郁达夫、成仿吾到学校任教。当时，广州已经成为革命策源地，郭沫若与郁达夫先行前往，成仿吾负责《创造月刊》第3、4期的编辑工作。不久，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账目混乱，难以维持，郁达夫被邀请回上海整顿创造社出版部并主编《创造月刊》与《洪水》刊物。郁达夫于1926年12月27日抵达上

海，立即着手编辑延期已久的《创造月刊》1卷6期和《洪水》半月刊3卷25期。在《洪水》“编辑后”中他重申半月刊的使命：“在一个缺憾很多的社会，‘补上一两个窟窿，或者将外面的纸糊的表面，打破一两个’。”

遗憾的是，因为对出版部的整顿过于激烈，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又因1927年1月16日《洪水》第25期上刊发郁达夫的政论《广州事情》等文，引起创造社同人的不满，矛盾激化后郁达夫决定脱离创造社。等成仿吾1927年7月31日从广州回到上海，郁达夫便将创造社出版部事务全部交出，于8月15日，在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刊登了“郁达夫启事”；人心险恶，公道无存，此番创造社被人欺压，全系达夫不负责任，不先事预防之所致。今后达夫与创造社完全脱离关系，凡达夫在国内外新闻杂志上所发表之文字，当由达夫个人负责，与创造社无关。特此声明，免滋误会。自此之后，郁达夫便脱离了创造社，他在创造社的编辑生涯也自此画上了句号。

### 从刊2012年第6期目录

#### 作家与作品

- “联接历史沟通人我”而长久活在历史中 ······ 张新颖
- 门外谈沈从文的杂文物研究 ······ 张均
- 召唤“隐藏的历史”——《暴风雨》动员叙述研究 ······ 卢燕娟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人民文化权力的兴起 ······ 王西强
- 论莫言1983年后中短篇小说的叙事视角试验 ······ 李玲
- 老舍《离婚》中的存在追问与人生悲感 ······ 俞晓霞
- 林徽因小说创作中的伍尔夫元素 ······ 罗维
- 重读姚雪垠的现代土匪题材小说《长夜》 ······ 徐仲佳
- 论《马桥词典》的“思想”与叙事之裂痕 ······ 徐仲佳

#### 文学史研究

- 谁在写史？——由《从刊》几篇文章看周作人《源流》读解的“误区” ······ 王瑜
- 通俗文学的转轨与大众审美趣味的变迁——《说说唱唱》的兴与衰 ······ 王力

跨越新旧的“第三文学空间”——论新文学发生初期的“蝙蝠派” ······ 胡安定

论京派乡土小说的审美趣味 ······ 余荣虎

#### 残酷研究

- 论残酷小说的“读不懂”与文学阅读的“反懂” ······ 高玉
- 卡夫卡与残酷的文化选择 ······ 罗璠
- 残酷小说的窥视书写 ······ 施畅
- 巫文化视域下的残酷小说 ······ 马福成

#### 诗歌研究

- 夹生·成色·驳杂——百年诗语的衍变与历险 ······ 陈仲义
- 透视“生命的曲线”：《孩儿塔》的另一种观照视角 ······ 徐美燕
- 论舒婷的接受误区与创作转型 ······ 王嘉良

#### 书评与综述

- “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读王景山《鲁迅五书心读》 ······ 钱理群
- 知人论世的《高长虹年谱》 ······ 杨兴玉
- 读冯济平编《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自述》 ······ 宋嵩
- 评陈军著《戏剧文学与剧院剧场——以“郭、老、曹”与北京人艺为例》 ······ 王金胜
-